

文旅融合背景下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评价

——基于2012~2023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毛淑雷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6日

摘要

大运河文化带作为我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载体, 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产业开发的协同耦合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研究以大运河沿线六省二市为研究对象, 基于2012~2023年省域面板数据, 从文化遗产和旅游产业两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 采用熵值法测算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两系统的时空演化规律与融合格局。研究发现: 时序层面, 两系统发展水平整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 2020年受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冲击出现阶段性波动, 但后续快速复苏; 耦合协调水平持续优化。空间层面, 文旅融合呈现显著的“南强北弱、东高西低”特征, 多数省域存在“旅游扩张领先, 文化遗产活化滞后”的结构性失衡。基于此, 文章提出差异化发展、强化文化遗产活化、构建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等建议, 为促进大运河文化带的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词

文旅融合, 大运河文化带, 耦合协调, 文化遗产, 旅游产业

Evalu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under 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2 to 2023

Shulei M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Abstract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serves as a core strategic vehicle for China's high-quality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and achieving synergistic coupling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s key to its sustainability. Focusing on the six provinces and two municipal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covering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ndustry dimensions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2 to 2023. The entropy method measur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s of both systems, and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reveals their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tegration patterns. The findings show: Temporally,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s of both systems trended steadily upward, with a temporary fluctuation in 2020 due to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followed by a rapid recovery; coupling coordination continuously improved. Spatially,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displayed a marked "strong south, weak north; high east, low west" pattern, and most provinces experienced a structural imbalance where tourism expansion outpaced cultural heritage revitalization.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enhanced cultural heritage revitalization, and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deepening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Keywords

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Coupling Coordination,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Indust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旅游产业是国民经济中极具活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柱产业。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遗产，其沿线串联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八省市的多元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运河文化带。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¹，明确提出推动大运河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与文旅深度融合，将大运河文化带打造为国家文化战略地标。大运河沿线8省(市)也相继出台了保护政策，这些政策举措推进了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有效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经济动能转化。

伴随我国文旅融合战略持续深化，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转化、旅游产业的文化赋能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大运河文化带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承载着历史文化遗产与区域发展的双重使命。然而，由于历史积淀、经济水平、区位条件以及地方治理模式的差异，这些省域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上面临着一些“非均衡”痛点。鉴于此，本文以大运河沿线的8省(市)为研究空间样本，收集2012~2023年的省域面板数据，将各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产业发展”

¹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5/09/content_5390046.htm

作为两个相互作用的系统，通过构建多维指标体系，定量评估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深入探讨其时空演进与空间分异规律。

2.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发展的系统耦合机制

文化遗产系统与旅游发展系统是大运河文化带文旅融合的两大核心子系统，二者互为支撑、双向赋能，形成了资源互嵌、要素联动、价值共生的系统性耦合关系。

文化遗产是旅游发展的核心资源与价值内核^[1]。历史遗存、非遗技艺与传统节庆，既为旅游目的地塑造了独特文化标识，也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有效提升旅游产品内涵与目的地吸引力；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等文化设施，既是遗产保护展示的载体，也拓展了旅游文化体验空间，为旅游提质增效提供支撑。

旅游发展则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提供了现实路径。旅游市场的经济效益，能够为遗产修缮、设施建设与非遗传承提供资金反哺；游客流量与消费需求，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向动态活化转变，实现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广泛传播；旅游产业发展还能带动文旅人才队伍建设，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专业化支撑。

两大系统在要素、结构、功能与效益层面形成整体耦合：要素层面，文化资源、设施、人才与旅游资源、服务、人力交叉融合；结构层面，文化保护体系与旅游供给体系相互适配；功能层面，文化传承与旅游体验、研学休闲叠加创新；效益层面，文化价值与旅游经济价值共生共赢。这种多层次的耦合机制，使二者形成有机整体，其协同水平影响大运河文化带文旅融合的整体质量。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大运河文化带是依托地域文化共性，以带状地理空间与交通网络为载体，以沿线城镇为发展主体，兼顾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与区域发展的跨区域带状遗产保护利用模式与规划体系。根据《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大运河文化带规划范围涵盖沿线八省(市)，即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

结合官方划定范围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大运河文化带所覆盖的六省二市为研究区域，研究时段为2012~2023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2025》²《中国统计年鉴》³及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对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以保证数据序列的连续性与可靠性。

3.2.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结合数据可得性、科学性、系统性原则，构建文化遗产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为文化遗产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用以衡量两大系统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整体水平；子系统层分为文化遗产系统与旅游产业系统，分别表征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综合水平和旅游产业发展综合水平。

文化遗产系统中，文化设施规模反映文化遗产展示、保护、传播的硬件基础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文化遗产资源存量表征区域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禀赋与存量水平^[2]，是文化遗产价值的核心载体；文化活动利用成效衡量文化遗产资源向公共文化服务转化的实际效果及公众参与度；文化投入

²<http://www.nianjiandata.com/books/directory-45267.html>

³<https://www.stats.gov.cn/sj/ndsj/>

与发展保障体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事业发展的资金、人力支撑力度。

旅游产业系统中,旅游基础资源载体选取 A 级旅游景区总数,表征区域旅游资源禀赋与核心吸引力;旅游服务配套设施选取星级饭店数、旅行社数,反映旅游产业的接待能力与服务供给水平;旅游市场经营效益直接衡量旅游产业的市场规模、经济贡献与发展活力;旅游从业人力支撑选取旅游产业相关从业人数指标,体现旅游产业的人力供给、服务保障与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其中,由于 2020 年后国际旅游相关数据缺失较多,故只选择国内旅游相关指标。

参考洪学婷(2020) [3]、刘璇(2025) [4]、王秀伟(2020) [5]等人的研究,各模块下选取相应指标予以量化表征。具体指标见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rand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ndustry
表 1. 大运河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权重
文化 遗产系统	文化设施规模	博物馆机构数	个	正向	0.062
		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数	个	正向	0.066
		艺术表演场馆机构数	个	正向	0.060
		群众文化机构数	个	正向	0.062
	文化遗产资源存量	文物业藏品数	万件	正向	0.060
		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数	个	正向	0.059
		国家级非遗项目数	个	正向	0.058
		省级非遗项目数	项	正向	0.059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人	正向	0.057
		省级非遗传承人	人	正向	0.061
	文化活动利用成效	博物馆参观人次	万人次	正向	0.063
		艺术表演场馆观众人次	万人次	正向	0.070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	万场次	正向	0.068
	文化投入与发展保障	文旅体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正向	0.060
		博物馆从业人数	人	正向	0.06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比	%	正向	0.074
旅游 产业系统	旅游基础资源载体	A 级旅游景区总数	个	正向	0.099
	旅游服务配套设施	星级饭店数	个	正向	0.095
		旅行社数	个	正向	0.097
	旅游市场经营效益	国内旅游人次	万人次	正向	0.101
		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正向	0.096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亿元	正向	0.102
	旅游从业人力支撑	国家 A 级旅游景区从业人数	人	正向	0.105
		旅行社从业人数	人	正向	0.100
		星级饭店从业人数	人	正向	0.098
		住宿和餐饮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比	%	正向	0.109

3.3. 研究方法

3.3.1. 熵值法与 TOPSIS 模型

为了避免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偏差,本文采用熵值客观赋权法测算各指标权重[6],并在此基础上运用 TOPSIS (逼近理想解排序法) [7]计算各省市在各年份的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U_1 和 U_2 。TOPSIS 法能够通过测算评价对象与正、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客观准确地评估区域系统发展水平。具体计算步骤为先对数据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各指标在量纲单位存在差异,利用熵值法通过信息熵计算各指标权重,计算所得权重见表 1;其次,利用 TOPSIS 法通过计算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欧氏距离,得出相对贴近度 U_i 。 U_i 越大,表示该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越高[8]。

依照上述方法,分别测算得到各省市历年文化遗产系统综合得分 $U_{1,it}$ 、旅游产业系统综合得分 $U_{2,it}$ 。

3.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Coupling Degree, C)仅能反映两大系统间交互作用强度,无法体现协同发展质量,易出现双低水平下的“伪协调”问题。为此,本文构建 D 耦合协调度模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综合衡量文旅融合的协调发展质量[9],公式如下:

$$C = 2 \times \sqrt{\frac{U_1 \times U_2}{(U_1 + U_2)^2}}$$

$$T = \alpha U_1 + \beta U_2$$

$$D = \sqrt{C \times T}$$

式中: C 为耦合度,取值范围 $[0,1]$; T 为文旅系统综合协调发展指数; α 、 β 为待定系数,表征子系统对整体融合发展的重要程度。文化遗产是旅游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与内容之源,而旅游产业是实现文化价值增值和资金反哺的最主要市场渠道,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参考以往研究,设定 $\alpha = 0.5$, $\beta = 0.5$ 。

为清晰展示耦合协调水平的阶段性特征,参考学界通用划分标准,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十个等级[10],如表 2 所示:

Table 2. Grading criteria fo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 D 值区间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0.0~0.1)	1	极度失调
[0.1~0.2)	2	严重失调
[0.2~0.3)	3	中度失调
[0.3~0.4)	4	轻度失调
[0.4~0.5)	5	濒临失调
[0.5~0.6)	6	勉强协调
[0.6~0.7)	7	初级协调
[0.7~0.8)	8	中级协调
[0.8~0.9)	9	良好协调
[0.9~1.0]	10	优质协调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大运河沿线省市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为了全面揭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文化遗产系统与旅游产业系统的演进规律，本研究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加权 TOPSIS 模型分别测算了 2012~2023 年各省市两系统的综合发展得分。

4.1.1. 文化遗产系统发展水平分析(U_1)

文化遗产系统是区域历史文化积淀与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集中体现，测算结果见表 3。2012~2023 年大运河沿线省市文化遗产系统整体呈现出“稳步攀升、政策催化、高位韧性”的演进特征。

Table 3.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表 3. 大运河沿线省市文化遗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年份	北京市	天津市	安徽省	山东省	江苏省	河北省	河南省	浙江省	均值
2012	0.225	0.063	0.210	0.234	0.428	0.261	0.306	0.383	0.264
2013	0.214	0.066	0.209	0.245	0.415	0.274	0.342	0.357	0.265
2014	0.216	0.075	0.220	0.288	0.420	0.279	0.346	0.374	0.277
2015	0.231	0.091	0.258	0.320	0.459	0.301	0.385	0.471	0.315
2016	0.250	0.089	0.279	0.356	0.473	0.306	0.400	0.529	0.335
2017	0.289	0.114	0.308	0.394	0.482	0.320	0.456	0.547	0.364
2018	0.301	0.127	0.321	0.441	0.476	0.339	0.452	0.570	0.378
2019	0.307	0.126	0.309	0.461	0.499	0.370	0.486	0.593	0.394
2020	0.270	0.109	0.285	0.455	0.487	0.354	0.458	0.526	0.368
2021	0.296	0.127	0.314	0.493	0.518	0.364	0.487	0.595	0.399
2022	0.262	0.115	0.329	0.505	0.506	0.369	0.497	0.584	0.396
2023	0.284	0.141	0.308	0.501	0.544	0.395	0.557	0.577	0.414
均值	0.262	0.104	0.279	0.391	0.476	0.328	0.431	0.509	0.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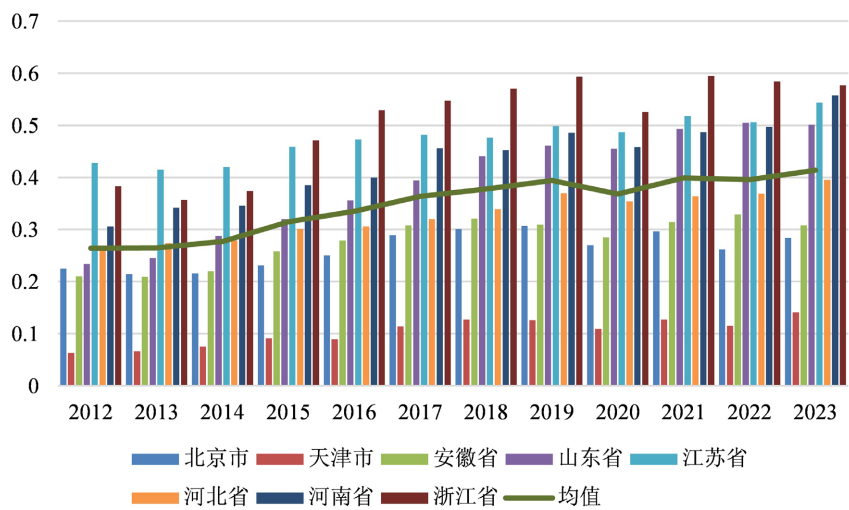


Figure 1.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in provinces and c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图 1. 大运河沿线省市文化遗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1) 时序上演进呈现“稳健爬坡、刚性增长”态势

从沿线省市文化遗产系统综合得分的整体均值来看, 均值由 2012 年的 0.264 持续上升至 2023 年的 0.414, 累计增幅达 56.82%, 见图 1。其演进轨迹可划分为三个特征阶段:

第一阶段(2012~2015 年)为常态化稳步积累期: 2014 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沿线省市相继启动了运河遗产保护规划, 文化专项资金开始注入, 促使系统得分实现初步积累。第二阶段(2016~2019 年)为国家战略驱动期: 这一时期,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等中央政策出台, 大运河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 各省市在文保单位提质增量、运河专题博物馆建设等方面迎来黄金期, 政策累积效应集中释放。第三阶段(2020~2023 年)为外部冲击波动与高位修复期: 2020 年受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影响, 部分线下文博场馆闭馆, 地方公共财政向卫生防疫领域倾斜, 导致文化遗产系统得分均值出现短暂且轻微的回落(从 0.394 降至 0.368)。但得益于文化遗产系统的“政策刚性”, 在 2021 年迅速反弹。这表明作为政府主导的公共事业, 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很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韧性。

2) 空间上表现为非均衡的“三级梯队”空间格局

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由于历史底蕴、地理幅员以及地方财政实力的客观差异, 在文化遗产综合发展水平上呈现出显著的梯度分化特征:

① 第一梯队(文化遗产高地: 浙江、江苏、河南, 均值 > 0.40)

浙江省(均值 0.509, 排名第 1)作为南方大运河的终点和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集大成者, 在文保资金投入、数字文博建设以及非遗保护方面长期走在全国前列, 其得分在 2021 年达到了 0.595 的高值。江苏省(均值 0.476, 排名第 2)作为大运河申遗的牵头省份, 拥有最长的运河航道和最密集的运河遗产点, 各年度得分极其稳健, 至 2023 年达到 0.544。河南省(均值 0.431, 排名第 3)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 依托“河洛文化”与“古都群落”的丰富资产, 近年来大力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文化遗产系统得分从 2012 年的 0.306 飙升至 2023 年的 0.557, 展现出极强的后发优势。

② 第二梯队(特色文化赶超区: 山东、河北、安徽、北京, 均值在 0.25~0.40 之间)

山东省(均值 0.391)得益于儒家文化与运河文化的深度融合, 从 0.234 升至 0.501。河北省(均值 0.328)与安徽省(均值 0.279): 两省分别承载着燕赵文化和徽淮文化。近年来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安徽段)建设的契机下, 通过加大地方财政对文物的保护力度, 文化遗产系统发展逐渐趋好。北京市(均值 0.262): 虽然北京作为首都拥有极高规格的历史文化资源, 但由于其行政区域面积有限, 在省域尺度的“总量指标”(如文保单位数量、非遗名录总量等)对比中未占绝对优势, 但也实现了稳健增长。

③ 第三梯队(空间要素规模瓶颈区: 天津, 均值 < 0.15)

天津市(均值 0.104): 天津作为直辖市, 在八省市中行政区划面积最小, 实体文化遗产资源总量及文博设施基数与大省相比相差悬殊, 导致其文化遗产系统得分长期偏低。但近十年也实现了一定进步。

4.1.2. 旅游产业系统发展水平分析(U_2)

旅游产业系统的综合得分是衡量区域旅游经济效益、产业规模、接待能力以及市场活跃度的核心指标。与文化遗产系统的“政策刚性与平稳增长”不同, 旅游产业系统具有强烈的市场依赖性、环境敏感性与周期波动性。

Table 4.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system in provinces and c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表 4. 大运河沿线省市旅游产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年份	北京市	天津市	安徽省	山东省	江苏省	河北省	河南省	浙江省	均值
2012	0.42	0.083	0.186	0.418	0.442	0.188	0.213	0.423	0.297
2013	0.424	0.079	0.295	0.426	0.454	0.196	0.214	0.442	0.316

续表

2014	0.425	0.082	0.228	0.484	0.491	0.218	0.211	0.457	0.324
2015	0.428	0.074	0.244	0.514	0.48	0.221	0.229	0.451	0.33
2016	0.431	0.15	0.251	0.499	0.504	0.27	0.259	0.387	0.344
2017	0.411	0.091	0.277	0.565	0.526	0.255	0.286	0.501	0.364
2018	0.461	0.094	0.307	0.608	0.539	0.297	0.325	0.489	0.39
2019	0.474	0.108	0.328	0.582	0.571	0.289	0.354	0.551	0.407
2020	0.373	0.076	0.248	0.492	0.48	0.214	0.277	0.497	0.332
2021	0.317	0.072	0.262	0.483	0.49	0.21	0.279	0.465	0.322
2022	0.281	0.043	0.251	0.455	0.449	0.194	0.24	0.454	0.296
2023	0.376	0.077	0.31	0.554	0.518	0.278	0.334	0.499	0.368
均值	0.402	0.086	0.266	0.507	0.495	0.236	0.268	0.468	0.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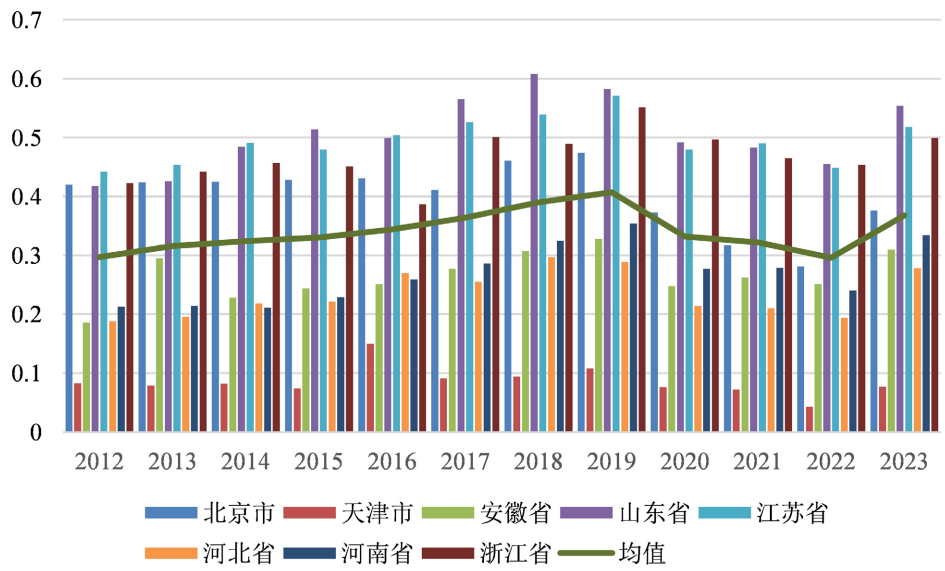


Figure 2.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tourism systems in provinces and c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图 2. 大运河沿线省市旅游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1) 时序演变：常态扩张、断崖式外生冲击与强弹性复苏

从大运河沿线八省市旅游产业系统得分的整体均值来看(表 4 最后一列), 2012~2023 年间, 均值由 2012 年的 0.297 演进至 2023 年的 0.368, 整体呈现出明显的“M”型双峰波折上升轨迹, 见图 2。其演变历程可精确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① 第一阶段：常态化高速扩张黄金期(2012~2019 年)

此阶段综合得分均值表现出单调递增态势, 由 0.297 持续攀升至历史最高峰 0.407, 累计增幅达 37.04%。这一时期, “全域旅游”红利释放, 大运河沿线交通路网(如京沪高铁等)的完善极大便利了跨区域旅游, 推动了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的井喷式增长。

② 第二阶段：外生危机冲击下的非对称衰退期(2020~2022 年)

受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影响, 均值在 2020 年降至 0.332, 并持续下降至 2022 年的 0.296(跌回至 2012 年水平)。这一时期跨省游受限、线下景区关停、文旅消费信心收缩, 导致高度依赖物理空间位移的旅游

产业遭受重创。

③ 第三阶段：产业韧性爆发与强劲复苏期(2023 年)

随着出行限制的全面解除，文旅消费刚性需求集中释放，2023 年均值 0.368 (基本恢复至 2017~2018 年水平)。这表明大运河沿线旅游产业具备坚实的产业基础和高复苏弹性。

2) 空间梯度：高度极化的“三级梯队”格局

在空间分布上，大运河沿线各省市的旅游产业系统综合得分表现出比文化遗产系统更为显著的南北极化与省际梯度差距。依据各省市均值，可划分为三个梯度：

① 第一梯队(旅游产业绝对主导区：山东、江苏、浙江，均值 > 0.45)

这三省是大运河沿线乃至全国的旅游产业巨头，得分水平长期领跑。山东省(均值 0.507，排名第 1)：旅游得分在 2018 年达到了 0.608 的历史极值。这得益于其全域旅游、乡村旅游的超前布局，以及“好客山东”品牌极为成功的市场营销，形成了庞大的国内旅游客源腹地。江苏省(均值 0.495)与浙江省(均值 0.468)：两省依托长三角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极高的人均消费水平以及密集的 A 级景区和高星级酒店集群，其旅游得分常年稳定在 0.45 以上，展现出极强的产业成熟度。

② 第二梯队(文旅错位与规模制约区：北京、河南、安徽，均值在 0.25~0.45 之间)

该梯队成员在旅游系统开发上面临着结构性瓶颈。北京市(均值 0.402)：作为高端文旅消费市场，人均消费、高端酒店等质量指标位居全国首位，但受地理面积限制，其在接待总量、旅游景区绝对数量等“规模指标”上不及山东、江苏等大省。河南省(均值 0.268)与安徽省(均值 0.266)：两省虽是文化资源大省(如河南)，但在旅游系统得分上表现一般。其旅游产业呈现出“人均消费低、入境游偏弱、文旅资源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化率低”的特征，属于典型的“有资源、轻产业”区域。

③ 第三梯队(产业转型与规模洼地区：河北、天津，均值 < 0.25)

河北省(均值 0.236)：尽管环绕京津，但河北旅游产品多集中于传统山水和红色旅游，运河沿线旅游开发相对滞后。天津作为直辖市，其空间尺度较小，在旅游综合得分核算中存在天然的规模劣势。

4.2. 大运河沿线省市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分析

Table 5.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provinces and c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表 5. 大运河沿线省市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

D	北京市	天津市	安徽省	山东省	江苏省	河北省	河南省	浙江省	均值
2012	0.6472	0.1541	0.5203	0.6567	0.8307	0.5695	0.6234	0.7919	0.5992
2013	0.6354	0.173	0.5798	0.6722	0.8271	0.5863	0.649	0.7792	0.6127
2014	0.6385	0.2141	0.558	0.7349	0.8448	0.6058	0.6497	0.7975	0.6304
2015	0.6577	0.2497	0.6041	0.7741	0.866	0.6254	0.6878	0.8622	0.6659
2016	0.6783	0.3086	0.6263	0.7992	0.8846	0.6597	0.7192	0.8669	0.6928
2017	0.7094	0.3147	0.6651	0.8508	0.8986	0.6617	0.7695	0.9277	0.7247
2018	0.7388	0.3388	0.691	0.8987	0.8994	0.6999	0.7907	0.9359	0.7491
2019	0.7492	0.3524	0.6919	0.904	0.9254	0.7178	0.8259	0.9729	0.7674
2020	0.6771	0.2875	0.6303	0.8683	0.8842	0.6575	0.7647	0.914	0.7105
2021	0.6759	0.3074	0.6612	0.889	0.907	0.6605	0.782	0.9389	0.7277
2022	0.628	0.195	0.666	0.8849	0.8826	0.6511	0.7585	0.9283	0.6993
2023	0.6916	0.3322	0.6828	0.9208	0.9331	0.7276	0.853	0.9439	0.7606
均值	0.6773	0.2689	0.6314	0.8211	0.882	0.6519	0.7394	0.8883	0.695

耦合协调度(D)旨在测度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在交互过程中的协同发展水平。用耦合度协调模型得到表5的测算结果,进一步对大运河沿线八省(市)双系统的协同状态进行时序演变、空间分异及演化路径的深度剖析。

4.2.1. 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特征：稳步攀升、危机波动与快速自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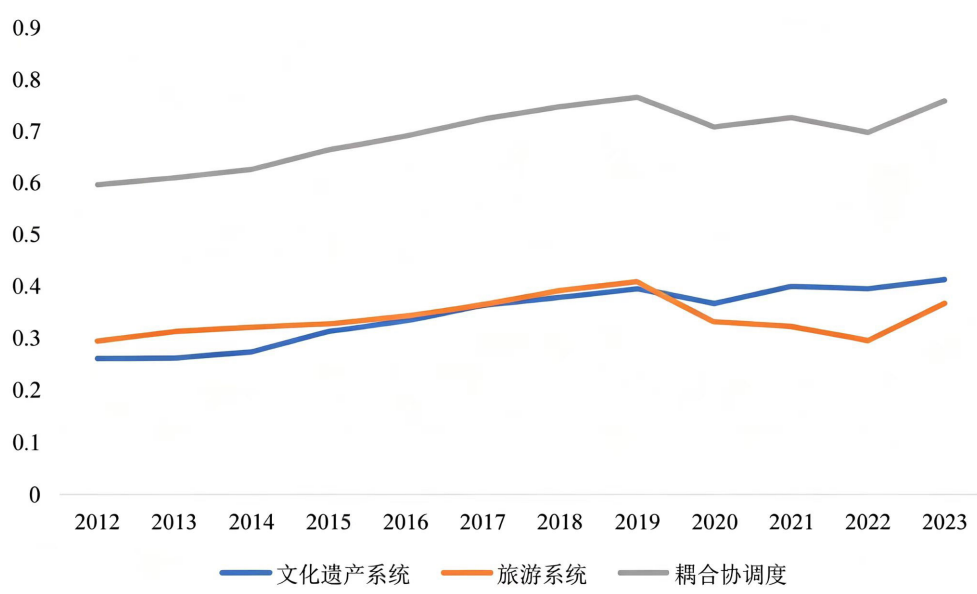


Figure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culture and tourism system in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图3. 大运河文化带文旅系统耦合协调度

从大运河沿线省市耦合协调度均值来看,研究期内八省市整体呈现出“平稳上升-外生冲击回调-快速强劲复苏”的演进轨迹,见图3。均值由2012年的0.5992(勉强协调)上升至2023年的0.7606(中度协调),整体协同效应显著增强。

1) 协同上升期(2012~2019年):耦合协调度均值从0.5992持续攀升至0.7674,整体实现了从“勉强协调”向“中度协调”的跨越。这一时期,大运河申遗成功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继推进,推动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理念的落地。文化遗产为旅游产品提供了优质场景,而旅游产业扩张又为文化遗产提供了市场内生动力。

2) 危机波动期(2020~2022年):受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均值在2020年降至0.7105,并于2022跌至“初级协调”区间。结合前文分析,此时期文化遗产系统仍受政策刚性保护保持高位运行,但旅游产业系统因出行限制出现断崖式下跌。这种非对称变化直接打破了原本的双系统平衡,导致耦合协调度出现结构性下滑,呈现出明显的“旅游滞后型”失衡。

3) 韧性复苏期(2023年):2023年,随着出行管制解除与旅游消费需求集中爆发,两系统强劲反弹,推动协调度回,基本恢复至冲击前的高水平协同状态,展现出大运河文旅融合系统极高的生态弹性和自愈能力。

4.2.2. 耦合协调度空间梯度格局：南北极化明显

大运河省域尺度上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南强北弱、南北双核、中坚支撑”的非均衡特征。根据12年平均耦合协调度D并结合两系统相对水平,可将八省市划分为四种典型发展类型:

1) 双高良好协调型(浙江、江苏、山东)

江浙两省长期处于高位稳定态势(浙江均值 0.8883, 江苏 0.8820), 这得益于其“高基数遗产要素”与“高能级旅游经济”的顺畅循环。形成了“遗产保护-产业变现-文化反哺”的良性循环。山东省(均值 0.8211)增势较快, 2023 年达到优质协调, 其“好客山东”品牌对齐鲁、大运河文化资源的成功转化, 带动两系统协调发展。

2) 中度过渡追赶区(河南、河北、安徽)

河南省(均值 0.7394, 排名第 4): 河南是研究期内协调度跨越最大、后发赶超最快的省份。这主要得益于河南近年来实施的“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以及国潮文化(如《唐宫夜宴》、清明上河园等)的爆火, 将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具有高附加值的旅游体验物, 实现了协同机制的良性跨越。河北省(0.6519)与安徽省(0.6314)也稳步上升, 但高溢价文旅产品仍待培育。

3) 规模错位协调型(北京)

北京市(均值 0.6773)虽然拥有高规格的文化资源与全国领先的旅游人均消费, 但受限于城市空间规模及在省域“总量指标”对比中的偏低表现, 双系统呈现“高质但规模错位”特征, 导致其协调度常年在 0.62~0.75 之间, 仍有较大释放空间。

4) 双低失调衰退型(天津)

天津市(均值 0.2689)长期处于中度失调状态, 面临典型的“双系统低值陷阱”: 主要原因是其本身文旅资源数量受面积限制, 且受周边城市北京的同质化虹吸, 导致系统因要素偏低而无法产生有效链接。

4.2.3. 动态演化路径异质性: 抗风险韧性与文旅不对称

对比 2020~2022 年间各省协调度的下滑幅度, 可以揭示出不同省域在面对外部公共卫生危机冲击时所表现出的“协同稳定性异质”:

1) “高韧性内循环型”(鲁、苏、浙)

在遭遇外部重创时表现出强系统韧性。例如, 浙江省在 2022 年仍维持在 0.9283 的高协调得分, 2023 年迅速回弹至 0.9439。这得益于其快速转入“微度假”和本地休闲等消费内循环模式, 维持了双系统在高位运行的生态平衡。

2) “强政策敏感与深度回调型”(北京)

北京市旅游系统表现出了极高的管控敏感度, 其协调度得分从 2019 年的 0.7492 跌至 2022 年的 0.6280 (跌幅达 16.18%)。北京作为首都, 在公共突发卫生事件期间执行了严格的防控政策, 导致其高度依赖的“跨省入京游”和“入境旅游”大幅减少, 导致协同效率下降。

3) “低位钝化、复苏迟滞型”(津、冀)

天津(2022 年跌至 0.1950 的低值失调)和河北(2022 年跌至 0.6511)在危机中恢复迟缓。这两地文旅产业底座相对薄弱, 产业链条短且自我造血功能差, 一旦受到外界重创, 往往面临“景区关停、消费降级、人才流失”的多重困境, 恢复周期明显拉长。

整体而言, 大运河文旅融合空间极化特征明显, 高值区域集聚固化, 低值区域突破缓慢, 区域不平衡问题突出。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 2012~2023 年大运河沿线六省二市文化遗产系统与旅游产业系统整体持续向好, 受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冲击出现短期波动后快速复苏。旅游产业系统增长速度显著快于文化遗产系统, 多数省市存在文旅发展结构性失衡, 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滞后于旅游产业开发。

第二, 时序层面, 大运河文旅耦合协调度持续提升, 整体由濒临失调演进为初级协调, 文旅融合互动机制不断完善, 国家大运河战略的政策赋能效果显著。

第三, 空间层面, 文旅融合呈现显著梯度分异格局, 江浙鲁为高值核心区, 豫皖京为过渡区, 津冀部分地区为低值滞后区, 空间极化、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

第四, 区域普遍存在系统错配问题, 高发展地区存在文旅同质化竞争, 低发展地区存在资源闲置、产业薄弱问题, 差异化、精准化发展不足。

5.2. 对策建议

1) 实施差异化文旅融合发展策略, 破解区域发展失衡

针对江苏、浙江等高协调区域, 聚焦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 打造大运河文旅品牌, 推进沉浸式遗产体验、文创 IP 开发、研学旅游升级,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针对山东、河南、安徽中等协调区域, 重点强化文化遗产活化, 深挖漕运文化、水工文化、民俗文化内涵, 补齐旅游产品创新短板。针对天津、河北低协调区域, 加大文化遗产修缮与保护投入,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培育特色文旅业态,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2) 强化文化遗产赋能, 扭转“重旅游、轻文化”失衡格局

摒弃粗放式旅游开发模式, 以大运河文化内核为核心, 推动文物资源、非遗资源、水系文化与旅游场景深度融合。依托博物馆、文化场馆、遗产廊道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产品, 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品牌价值、经济收益转化, 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双向赋能。

3) 构建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 打破行政壁垒

立足大运河线性、跨区域特征, 建立六省二市协同发展机制, 联合打造文旅精品线路、共享客源市场、共建品牌体系。推动资源互补、业态共建、市场互通, 破解碎片化发展问题, 形成全域联动、协同共进的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4) 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夯实文旅融合发展基础

持续加大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场馆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投入, 健全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协同监管机制。鼓励文旅业态创新, 培育夜间文旅、研学旅行、康养文旅、数字文旅等新业态, 推动大运河文旅融合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

参考文献

- [1] 张朝枝, 朱敏敏. 文化和旅游融合: 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路径[J]. 旅游学刊, 2020, 35(3): 62-71.
- [2] 鄢继尧, 赵媛, 郭宇, 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异及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3, 39(4): 86-95.
- [3] 洪学婷, 黄震方, 于逢荷, 等. 长三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及补偿机制[J]. 经济地理, 2020, 40(9): 222-232.
- [4] 刘璇, 程占红, 许磊, 等. 沿黄九省(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发展的时空动态耦合机制[J]. 中国生态旅游, 2025, 15(4): 841-854.
- [5] 王秀伟. 大运河文化带文旅融合水平测度与发展态势分析[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37(3): 60-69.
- [6] 尹秀英, 丰华. 熵权法下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 47(7): 125-131.
- [7] 闫瑾, 闫昊本, 刘兰翠. 基于 TOPSIS 方法的碳中和路径评估[J]. 科研管理, 2025, 46(4): 169-181.
- [8] 李丽, 徐佳. 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其驱动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20): 49-52.
- [9] 岳菊, 戴湘毅. 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耦合机制及协调效应——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4, 44(1): 230-240.
- [10] 许卫华, 张力仁, 崔晶晶, 等. 黄河流域现代产业体系耦合协同水平测度及其时空演变[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3, 42(2): 1-6.